

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

张月友, 方 瑾

摘 要: 与传统离岸外包不同, 逆向外包的兴起, 为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来了新契机。更重要的是, 逆向外包的出现可能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基于 2005—2014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服务行业的逆向外包度, 实证分析驱动中国实施逆向外包战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 发达国家的服务质量和相对用工成本, 及其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亲疏等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 具有稳健、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按要素密集度对服务业进行分类回归时发现, 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果表现了与总体样本模型有较大差异外, 其他三类服务行业与总体样本回归具有相似的检验结果。

关键词: 逆向外包; 驱动力; 服务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7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5-0153-15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5.015

一、问题提出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经济进入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它以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为特征, 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与服务外包, 在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工程人才^{[1][2]}。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全球化”战略相对应, “逆向外包”是一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才争夺的战略形式^[3]。作为一个新词, “逆向外包”较早由森 (Sen) 公开报道。Sen^[4]发现, 为了解决国内航空业发展所面临的飞行员供给短缺问题, 印度和中国通过逆向外包, 开始大举从欧洲招募合格飞行员。

逆向外包有三种方式, 分别为: 直接雇佣 (Direct Hire)、内涵式 (Organic) 和外延式 (Inorganic)。其中, 直接雇佣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直接聘用发达国家人员到本国工作; 内涵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采取在发达国家设立基地并就地雇佣工人开展业务; 外延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采取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并开展工作。Sen^[4]报道的中国航空公司从欧洲招聘飞行员的案例即属于以上三种中的第一种, 也即为“直接雇佣”的逆向外包方式。但实际上, 尽管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于 2008 年启动“千人计划”工程, 截至 2016 年, 已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6 074 人, 但这种逆向外包方式在中国发生并不多。而其他两种, 诸如“内涵式”和“外延式”的逆向外包策略, 在中国已经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转变和机制设计研究”(15BJY02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创新全球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7WTA001); 江苏省社科联重大应用研究课题“江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18SYZ001)

作者简介: 张月友, 经济学博士,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江苏 南京 210093); 方瑾,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

普遍^①。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进入加快实施阶段和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逐年增长。据普华永道“交易服务”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海外并购活动自2013年开始整体复苏,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更是双双呈逐年大幅增长趋势,到2017年,其并购数量和金额大于2014年和2015年的总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青睐于美国和欧洲等技术、知识产权及品牌都较为成熟的市场。通过“外延式”逆向外包策略,中国寻求将这些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专利和品牌引入国内市场^[5]。那么,具体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开展逆向外包实践?或者说,中国企业通过逆向外包在全球选址及进行生产和服务网络布局时,着重看中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现象,逆向外包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当前的主要学者也集中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直到2008年6月,在索伦斯公司对印度的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地理逆转现象发布正式研究报告以后,逆向外包这种新潮流才开始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如果大致将相关研究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很容易发现,规范研究方面的主要文献涉及对逆向外包的定义与分类和开展逆向外包的条件、作用与意义等的论证。比如,张月友等^[3]率先对逆向外包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在模型化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合理性方面,做了初步尝试。江小涓等把逆向外包上升到企业/国家战略层面,呼吁中国应抓住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这一机会,通过积极实施逆向外包战略,提升本国企业实力和对外开放水平^{[6](P60)[7][8]}。Kedia等^[9]讨论了逆向外包的成因。刘丹鹭等^[10]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需要具备的条件。郑飞虎等^[11]区分了在岸逆向外包和离岸逆向外包的不同,等等。近年来,伴随国际服务外包的兴起和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文件的出台和实施,逆向外包作为一个新兴的热点主题,得到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逆向外包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不过,从研究方向上看,大多聚焦于逆向外包对作为发包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如,陆续有学者实证分析逆向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12][13]}、成本节约^[14]、就业结构^[15]、生产率^{[16][17]}、创新绩效^{[18][19]}和技术进步^{[20][21]}等的影响。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外包战略的关注仍然不足^[22],尤其是,尚未发现有关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而这本该是在实证研究逆向外包的影响之前就要厘清的问题。本文尝试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是驱动传统离岸外包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对于逆向外包,张月友等^[3]认为除了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及服务素质外,企业战略和靠近东道国市场等也是推动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地理逆转的重要因素。借鉴以往相关文献思想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东道国的服务质量和用工成本、外包活动中中外双方可交流情况、中外双边政治关系以及与传统离岸外包的联系等五个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位置,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长期处于

^① 近几年,作为一种海外存在,中国企业通过“内涵式”逆向外包,在海外设立研发基地,获取国际先进智力资源的案例也不胜枚举。例如,在汽车行业,长安汽车分别于2003、2008、2010和2011年,分别在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英国诺丁汉和美国底特律设立研发中心;在航空行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远赴美国洛杉矶创办研发基地;在通信、ICP和家用电器行业,华为在英、法、加拿大等多国设立研发中心,美国硅谷更是吸引了百度、长虹、苏宁等多家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中心落户。具体参见:马丹等.集智海外,创新共赢——探访中国海外研发基地[DB/OL].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18/c_1115663358.htm。

“微笑曲线”底部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高素质人才和高端科技技术的需求愈加迫切。但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获取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是一道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现实难题, 中国也不例外。由于逆向外包的主要发包对象是发达国家, 相比传统的离岸服务外包, 逆向外包对知识、技术溢出作用更强。非发达国家通过实施逆向外包能够变被动为主动^[20], 通过与逆向外包中发达国家的接包企业签订附加协议和合同条款等方式, 要求其对本国企业的员工开展技能培训, 发展中国家还能更好地获取全球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1]。因而, 作为非发达国家网罗全球创新资源的逆向外包, 对承接国本身的技术发展和高级生产要素有较高的要求。综上所述,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 基于创新驱动追求, 某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越高, 中国企业越可能向该国进行逆向外包。

在传统的离岸外包关系中, 作为发包国的发达国家, 为了实现成本套利, 经常将一些低技术含量、标准化的制造业业务外包至中国和印度这类拥有优渥的人口资源优势的低用工成本国家^[23]。但正如假设一那样, 在标志着离岸外包业务发生了地理逆转的逆向外包关系中, 资本禀赋并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在意用工成本的高低。相反, 仅从地理位置转换来看, 逆向外包中离岸外包承接方的转变似乎正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用工成本的升高。如何理解这种单纯的从绝对工资水平比较视角得出的看似荒谬的结论呢? Hahn^[22]的研究发现, 逆向外包中, 发达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及其高科技技术不仅保证了这种离岸外包业务能更高效的完成, 且能带来发展中国家企业时间成本的节约, 更重要的是, 还能为作为发包国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高素质的服务回报。根据这一思想, 如果在价格中纳入质量因素,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同样质量的服务供给, 很容易推测, 发达国家的绝对用工成本虽然很高, 但其相对用工成本很可能是低的。如此, 通过逆向外包, 发展中国家虽然无法像传统离岸外包中的发达国家那样寻求绝对成本套利, 但可以进行相对成本套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进行这种相对成本套利的过程, 可以通过考察相对服务质量的劳动用工成本指标的变化观察到。比如, 将相对服务质量的劳动用工成本定义为单位服务质量的劳动力用工价格, 即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 = 用工成本 / 服务质量^[3]。可以发现, 从该指标的比值看, 只要分母的服务质量提升幅度高于分子的工资水平提高幅度,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相对成本套利便成为可能。所谓的“高工资可能是低成本”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综上所述,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 一国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越低, 中国企业越有动力向该国开展逆向外包。

除了追求高技术服务和进行成本套利之外, 语言、文化、政治、法律及教育等的差异也是影响离岸外包发展的主要因素^[24]。特别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 世界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 汉语正逐步朝着全球第二语言的目标逼近。同时, 汉语的学习也充分渗入到各发达国家, 为中国与其发展国际贸易奠定了更为坚实的语言基础。在传统的离岸外包活动中, 接包国与发包国之间的语言相通, 不仅能减轻因地理距离导致的心理障碍, 有助于外包活动的有效进行, 而且能降低因沟通障碍导致的贸易成本。比如英语作为国际官方语言, 随着英语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普及, 英语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发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影响力逐步逼近中国, 与中国共同作为制造业离岸外包的承接大国, 其最大优势之一正是英语是其官方语言^[25]。Doh 等^[26]甚至发现, 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更能够吸引同样说英语的国家对其开展 FDI。因此, 在逆向外包过程中, 作为接包方的发达国家能否熟练掌握发展中国家的语言, 也理应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对其成功开展逆向外包活动的另一重要驱动力。鉴于此, 本文将各发达国家的汉语水平纳入到可能影响中国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关键因素之中。综上所述,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 发达国家掌握汉语水平越高, 中国越有可能向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

国际政治关系与经贸互动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时代背景的转变, 各国意识到单纯靠军事力量的强大来增强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手段已难以为继, 和平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以建立友好的国际政治关系为基础, 共同促进以经济为核心及科技创新带来

的综合国力的强盛成为各国的制胜之道。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也使得国家间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潘镇等^[27]认为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属于重要的双边制度联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增强了经济和贸易活动往来的积极性。一方面，企业可以从中得到信号，预期东道国更愿意接纳关系友好国家企业的进入，从而加强企业未来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当地政府打交道，同时还面临着东道国的制度风险。一般来说，东道国视其与企业母国友好关系的差异，相关政策各不相同。比如在彼此关系友好的国家，东道国可能根据双方协定给予投资企业“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28]。由于逆向外包属于跨国界的贸易活动，同时受到母国及东道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当下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东道国制度与我国制度的不同，使得我国对其开展逆向外包面临着许多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而东道国与我国间友好的双边外交关系为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风险。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四：与中国政治关系越友好的发达国家，中国越愿意对其开展逆向外包。

逆向外包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只是作为发达国家离岸外包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存在，属于发达国家企业充当主导外包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3][6](P60)[29]}。驱动这种逆向外包的因素，索罗斯认为，为了更好地完成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外包及其交付任务，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原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或离岸交付中心，不仅更靠近目标市场，方便与发包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还能达到有效规避市场管制和开拓更大客户群的目的^{[3][29]}。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以往承接国际离岸外包活动的情况，有可能深刻影响这类新的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五：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离岸外包业务越多，越有动力对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

综上，如果各用一句话进行总结，五个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假说可以通俗地表达为：“当我们国家做不了时，外包给别国做”、“当别国做比国内做便宜时，外包给别国做”、“如果外包给别国做，倾向于外包给与我国有‘共同语言’的别国做”、“如果外包给别国做，倾向于外包给与我国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别国做”和“旧的外包历史会影响未来新的外包业务开展”。

三、变量界定与计量模型

（一）逆向外包度指标设计

自传统离岸外包兴起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定义。其中，以 Feenstra 和 Hanson^{[30][31]}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离岸外包就是从国外的服务供应商处购买用于本国生产的中间投入。同样，Crinò^[32]在有关服务离岸外包对白领阶层就业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在离岸外包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发包国将一部分业务分离至国外完成之后，会重新购买这些业务/产品来完成国内剩余的服务或生产流程。基于类似观点，国际上涌现出大量有关离岸外包的测度方法。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 Feenstra 和 Hanson^{[30][31]}创造的 FH 离岸外移指数，其外包度用公式表示为：

$$OSS_i = \sum_j \frac{X_i^j M_j}{Y_i C_j} \quad (1)$$

其中， X_i^j 代表第 i 行业生产所需第 j 行业的中间投入； Y_i 代表第 i 行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的总投入； M_j 表示对第 j 行业的总进口； C_j 表示对第 j 行业的总消费； $\frac{X_i^j}{Y_i}$ 衡量了生产一单位 i 行业产品的总投入中来源于第 j 行业产品的比重； $\frac{M_j}{C_j}$ 衡量了国内对第 j 行业的总消费来源于进口的比重。因此，两者相乘的经济学含义就是，从国外第 j 行业进口产品投入到第 i 行业生产中的数量占第 i

行业总产出的比例, 对 j 的取值加总求和所得到的 OSS_i , 即为第 i 行业生产对外国总中间投入产品的利用率, 可近似表示为第 i 行业的外包度。OSS 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 其值越接近于 1, 说明中间投入品中来自国外的需求较多, 其离岸外包度也就越高; 反之, 说明中间投入品中来自国外的需求越少, 其离岸外包度也就越低。

自 FH 离岸外移指数推出以来, 众多国内外学者以此方法为基础, 构建出符合自身研究需要的离岸外包测度指标。例如, 国内学者孟雪^[16]在研究中国开展逆向外包对本国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中便认为, 中国第 i 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可表示为如下公式:

$$ROSS_i = \sum_j \frac{X_i^j K_j^F}{Y_i K_j} \quad (2)$$

其中, X_i^j 代表第 i 行业使用第 j 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产值; Y_i 代表第 i 行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的总投入; K_j^F 表示第 j 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 K_j 表示第 j 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投资总额; $\frac{X_i^j}{Y_i}$ 表示为生产一单位第 i 行业产品, 总投入中来自第 j 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比重; $\frac{K_j^F}{K_j}$ 表示第 j 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总投资中来自于外资的比例。两者相乘的经济学含义为, 投入到第 i 行业的来自国外第 j 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占 i 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对 j 的取值加总求和便得到 $ROSS_1$, 即为本国第 i 行业的生产对外国总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的利用率, 可近似表示为中国第 i 产业的外包度。取值情况同公式 (1) 的分析。

由于本文以中国为发包方, 讨论作为接包国的发达国家的各要素对于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 且是研究中国的总体服务业而非单个细分服务行业的逆向外包情况, 不能直接套用上述指标, 需要另行设计逆向外包度指标。因此, 借鉴上述各类测度离岸外包的方法, 本文构建中国对某单个接包国家的逆向外包度公式为:

$$ROSS_i = \sum_k \sum_j \frac{X_{ik}^j}{Y_k} \quad (3)$$

其中, X_{ik}^j 表示第 k 服务业行业生产所用到的第 i 国家第 j 服务业行业的中间投入, Y_k 表示第 k 服务业行业生产所需的全部中间投入, $\frac{X_{ik}^j}{Y_k}$ 则代表第 k 服务业行业利用第 i 国家第 j 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数量占其总投入的比重。分别对 k 和 j 的取值加总求和便得到公式 (3)。其经济学含义为, 中国开展逆向外包时, 利用第 i 国家服务业中间投入的情况, 也即中国企业对第 i 国家开展的逆向外包度, 其取值范围大于等于 0, 但不再必须小于等于 1。这是因为, 如果中国某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服务全部来源于某一发达国家, 则中国该细分服务业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就为 1, 加总各细分服务业后的中国总服务业逆向外包度必然大于 1。例如, 2007 年, 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中, 家庭作为雇主的活动及未分化的商品和服务这一大类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全部来自于英国, 因此, 中国这一大类服务行业对英国的外包度就为 1, 该年中国总服务业对英国的外包度便达到了 1.03, 也即, 该年中国对英国的逆向外包度就为 1.03。

(二) 主要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依据上述对逆向外包的测度方法, 将中国作为母国对发达国家开展的逆向外包的外包度 ($ROSS_i = \sum_k \sum_j \frac{X_{ik}^j}{Y_k}$) 作为被解释变量。计算该指标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 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 数据更新到 2014 年, 而逆向外包现象又较早由森 (Sen) 在 2005 年发现, 因此, 本文将考察期定

为 2005—2014 年。再由于逆向外包的接包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故本文选择考察期间,综合发展程度较快的 16 个发达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包括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瑞典、瑞士、英国、韩国、日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比利时。

2. 解释变量:工资水平、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汉语水平、双边外交关系和传统外包度。

(1) 工资水平 (*Wage*):根据假设 1,获得服务质量满足或创新资源是发展中国家进行逆向外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且待接包国家的服务质量和创新资源水平可由该国家工资水平来衡量,即某一国的工资越高,则认为该国拥有较高的服务质量,或者认为从该国能获得较高的创新资源。因此,本文将分别查找上述 16 个发达国家在 2005—2014 年间的平均工资水平^①,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同时,根据当年实际平均汇率水平,将 16 个国家的工资额换算为以人民币表示的工资额。

(2) 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 (*Cost*):根据上文可以知道,本文认为待接包国家低的相对用工成本(质量用工成本=用工成本/服务质量)也是逆向外包的驱动力之一。这里的用工成本同样采用上述各发达国家平均工资水平表示;而对于服务质量的测量,为避免与变量 a 重复,用一国总人数中接受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数比例来表示,即一国公民的受教育率越高,则认为该国的服务质量越高^[2]。因此,将收集 2005—2014 年间,16 个发达国家在各年里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来衡量这些国家提供服务的质量水平,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 汉语水平 (*Chinese*):由于语言为两国之间能否进行有效沟通的工具,又由于本文实施逆向外包的国家是中国,因此,本文将考察 16 个发达国家使用的汉语情况,该信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著的“世界概况”。借鉴 Hahn^[22]的研究,某国家使用汉语人数位居该国使用各个语言人数的前三名之内,则认为该国使用汉语的水平非常高。本文将此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表达式如下:

$$Chinese_i = \begin{cases} 1 & \text{if } i \text{ 国家使用汉语人数排名前三之内} \\ 0 & \text{if 其他} \end{cases} \quad (4)$$

(4) 双边外交关系:国家间政治关系涉及多个领域和层次,资料收集也极其繁杂且难以梳理,因此,学术界目前为止仍未有能全方位准确衡量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方法。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分别以下两种方法对双边政治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双边来往: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普遍采用大事件分析法度量国家间政治关系。张建红等^[33]采用高层互访事件赋值法对两国间发生的外交事件进行统计归纳赋值。此外交事件主要指双边外交访问,包括两国副部级及以上级别的政治领导人互访、在第三国会晤及互相问候。其中,将国家元首级互访、会晤和问候的事件分别赋值为 2,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事件赋值为 1,最后以这些事件所得到的平均值来表示双边政治关系亲厚水平。本文借鉴以上方法衡量 2005—2014 年间中国与 16 个发达国家的友好程度,但为了更加客观比较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关系的亲密差别,最终以各年事件赋值总值代表两国双边来往程度,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社相关新闻报道。

第二,外交关系级别:除以上外交事件外,中国还同多个国家以建交的形式达成友好关系。受潘镇等^[27]利用外交关系级别作为衡量两国间政治关系友好程度指标的启示,本文对国家间是否建立建交、合作和伙伴等关系进行赋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除单纯建交外,还形成多

^① 这里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指从事所有行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根据定义,由于逆向外包特指服务行业,本文利用发达国家服务业平均工资应更能准确衡量承接国的服务质量,但在下文中,为避免质量用工成本中用工成本与服务质量指标设计的重复,本文也利用受高等教育率来衡量服务质量,而出于统计上的困难,受高等教育人数中从事服务行业情况难以了解,本文未区分服务行业受教育情况,为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指标(用工成本/服务质量)的合理性,本文选用所有行业在内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计算。另外,在各样本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占比最大,因而,利用所有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近似衡量服务业工资水平也是合理的。

种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 2005—2014 年间中国分别与 16 个发达国家建交的实际情况的搜集, 将各类关系依等级由低到高分: 不建交、单纯建交、合作关系、全面合作关系、全方位合作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九种情况, 并且依次赋值为 0、1、2、3、4、5、6、7 和 8。其主要划分等级依据为: 首先, 国家所有后续外交关系以建交为基础; 其次, 战略伙伴关系指的不仅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其辐射范围更广, 涉及军事等更加核心领域的合作, 且彼此之间达到了一定的信任度, 在重大问题中不存在根本分歧, 而合作关系涉及范围较小, 且容忍对重大事件意见分歧的存在, 因此, 外交关系级别中, 战略伙伴级别高于合作关系级别; 另外, 无论是在合作还是伙伴关系中, “全方位”指的是多维的、立体的, 比“全面”涉及范围更广更深。以上外交关系信息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其中, 由于中美、中日间外交关系复杂多变, 因此, 借鉴潘镇等^[27]对国家外交关系的划分, 将中美与中日间关系定位为建交。

(5) 传统离岸外包度: 由于假设 5 预计存在部分逆向外包可能属于传统外包下的子包业务过程, 因此, 将发达国家作为发包方, 将业务外包至中国的传统外包开展情况纳入到中国对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中。同样, 借鉴以往文献对外包度的定义^{[30][31]}, 本文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传统离岸外包度构建为公式 (5):

$$OSS_i = \sum_m \sum_n \frac{X_{im}^n}{Y_m} \quad (5)$$

式 (5) 中, X_{im}^n 表示第 i 国家第 m 行业 (这里不再局限于服务业) 生产所用到的中国第 n 行业的中间投入, Y_m 表示第 i 国家第 m 行业生产所需的全部中间投入, 则 $\frac{X_{im}^n}{Y_m}$ 代表第 i 国家第 m 行业利用中国第 n 行业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重。对 n 和 m 分别加总求和便得到的公式 (5), 表示为传统离岸外包中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重, 也即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离岸外包度。本文主要考察 2005—2014 年间, 上述 16 个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传统离岸外包程度, 数据同样来源于历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

(三) 控制变量

由于本文关于影响中国逆向外包开展因素的研究主要来源于接包国方, 并未考虑本国因素, 因此, 需要考虑将影响逆向外包业务开展的中国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中。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母国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技术进步发展报告》。首先, 一般来说, 本国劳动力成本越高, 对企业开展逆向外包越有推动作用。且随着本国人均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 发达国家企业陆续撤出中国市场, 该因素可能对逆向外包的兴起有着潜在的促进作用。因此, 研究及控制该变量有其必要性。劳动力成本用平均劳动工资表示。其次, 一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其对外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依托, 该指标可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再次, 在全球范围对高新技术的寻求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20], 而作为逆向外包的发包国, 其自身的技术进步情况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逆向外包的开展。最后, 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影响该国企业的外包活跃度, 很难想象严重封闭的经济国家会有高的逆向外包度。本文的技术进步指标用中国授权专利量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贸易总规模与国内 GDP 的比值来衡量。另外, 为避免上述各控制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同时为了更合理地体现出中国与各样本发达国家间的差异, 将中国的平均劳动工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度调整为相对 16 个发达国家的相对平均劳动工资 (*Rehomecost*)、相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Regdp*)、相对技术进步 (*Readvance*) 和相对贸易开放度 (*Reopening*), 其中各计算指标需要的发达国家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网站。

四、模型设定与回归分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 将模型初步设定为:

$$ROSS_{it} = \beta_0 + \beta_1 wage_{it} + \beta_2 cost_{it} + \beta_3 chinese_{it} + \beta_4 relation_1_{it} + \beta_5 relation_2_{it} + \beta_6 OSS_{it} + \epsilon_{it} \quad (6)$$

其中 i 代表逆向外包的东道国, 也即发达国家, t 代表年份, β_i 是系数。

1. 对 (6) 式函数形式进行检验。通过对模型的 linktest 和各变量的 RESET 检验, 发现上述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二次项的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包含了各解释变量二次项的信息, 因此, 将 $ROSS^2$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 并通过了 linktest 检验。

2. 计算方差膨胀因子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最大的 vif 仅有 5.16, 远小于 10, 因此, 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 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回归的有效性。

3. 处理内生性问题。首先, 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本文主要考察东道国方面的因素对母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 而忽略了母国本身因素。为减弱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误差, 主要从母国政治支持程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引入可能对逆向外包产生影响的因素。其次, 对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 DWH 检验以确定其内生性, 检验发现 $relation_1$ 的 DWH 检验 P 值小于 0.05, 故进一步通过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由于国家间经济贸易互动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国间的交往是否密切, 因此, 将中国分别对 16 个发达国家的滞后一期货物进出口总额 (IE) 作为 $relation_1$ 的工具变量, 并通过了该变量的外生性检验和与 $relation_1$ 的相关性检验, 故确定其为 $relation_1$ 的有效工具变量。

4. 消除异方差问题。利用 BP 检验的方法检验异方差问题, 发现部分变量未通过检验。考虑使用 WLS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发现, WLS 估计方法虽提高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 但主要解释变量 $wage$ 的系数变为负, 与理论预期不符, 因此, 将利用稳健标准误来解决异方差问题。

5. 考虑到传统离岸外包的存在对当期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有滞后影响, 因此, 模型将引入其滞后一期的变量加以检验。

6.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主要有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大类, 通过 F 检验、LM 检验和 huasman 检验分别确定模型应选用个体和时间双向的固定效应模型^①。

经过以上处理, 本文将模型 (6) 重新构建为:

$$ROSS_{it} = \beta_0 + \beta_1 wage_{it} + \beta_2 cost_{it} + \beta_3 chinese_{it} + \beta_4 relation_1_{it} + \beta_5 relation_2_{it} + \beta_6 OSS_{it} + \beta_7 OSS_L_{it} + \beta_8 ROSS_{it}^2 + \beta_9 rehomecost_{it} + \beta_{10} regdp_{it} + \beta_{11} readvance_{it} + \beta_{12} reopening_{it} + \sum year + \epsilon_{it} \quad (7)$$

其中, OSS_L 为 OSS 滞后一期变量, $\sum year$ 为考虑模型的时间效应。

(二) 描述性统计

表 1 是对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1 可以看出, 中国对 16 个发达国家的逆向外包的最小值为 0.000 369 8, 最大值为 1.034 146, 平均值只有 0.029, 说明中国对各发达国家的逆向外包差异较大。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各因素中, 有效工资 ($Wage$)、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 ($Cost$)、汉语水平 ($Chinese$)、双边关系 ($relation_1$ 、 $relation_2$) 和传统外包度 (Oss) 的标准差分别为 7.885 332、0.363 268 2、0.441 374 4、7.916 126、2.544 695 和 0.092 822 5, 各指标

^① 限于文章篇幅, 正文中未报告上述各类检验结果。

之间差异较大, 说明各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无法直接观察到各因素对逆向外包业务开展的具体影响程度, 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ross</i>	160	0.029 1241	0.083 831 3	0.000 369 8	1.034 146
<i>wage</i>	160	32.011 34	7.885 332	14.406 58	54.797 43
<i>cost</i>	160	0.974 370 5	0.363 268 2	0.430 823 1	1.909 641
<i>chinese</i>	160	0.262 5	0.441 374 4	0	1
<i>relation _1</i>	160	8.818 75	7.916 126	0	38
<i>relation _2</i>	160	3.2	2.544 695	1	8
<i>oss</i>	160	0.163 421 9	0.092 822 5	0.015 732 5	0.433 747 5
<i>oss _L</i>	144	0.156 18	0.088 183 5	0.015 732 5	0.433 747 5
<i>recost</i>	160	0.141 812	0.046 537 2	0.014 630 5	0.283 179 3
<i>regdp</i>	160	0.100 385	0.051 409 5	0.031 753	0.271 495 5
<i>reopening</i>	160	1.003 056	0.565 161 3	0.238 921	2.988 277
<i>readvance</i>	160	168.089 3	339.059 3	0.254 063	3 046.141

资料来源: 作者通过 stata 计算。

(三) 回归分析

依托 (7) 式进行回归, 得到各模型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 作为参照系, 模型 1 为使用稳健标准误的 OLS 回归, 并在有效控制母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变量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检验。模型 2 和模型 3 为逐步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的模型。另外, 与其他国家相比, 由于国家间的外包活动开展越频繁, 就越可能加深两国间的政治来往, 这就使

表 2 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4)
<i>wage</i>	0.000 073 3 (0.63)	0.000 197 2 (0.50)	0.000 682 3** (2.06)	0.000 922 1*** (2.80)
<i>cost</i>	-0.013 645 1*** (-4.72)	-0.028 031 9*** (-3.46)	-0.032 876 6*** (-4.38)	-0.029 361 9*** (-5.28)
<i>chinese</i>	-0.004 150 7 (-1.63)	0.001 629 (0.37)	0.003 586 5 (1.09)	0.004 521 (1.44)
<i>relation _1</i>	0.001 101 2*** (7.56)	0.000 286 6** (2.21)	0.000 277 9* (1.91)	0.000 018 2 (0.18)
<i>relation _2</i>	-0.001 865 7*** (-5.79)	0.000 056 2 (0.11)	0.000 081 9 (0.19)	0.000 119 2 (0.28)
<i>oss</i>	0.010 040 2 (0.54)	0.011 722 8 (1.31)	0.010 286 (1.03)	0.013 882 7* (1.73)
<i>oss _L</i>	0.026 179 2 (1.32)	-0.002 06 (-0.15)	-0.001 053 7 (-0.10)	-0.001 315 (-0.15)
<i>_cons</i>	0.010 420 2 (1.32)	0.017 910 1 (0.89)	-0.013 083 9 (-1.14)	-0.000 678 2 (-0.9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N	144	144	144	128
R ²	0.992 2	0.982 2	0.976 6	0.980 0

注: 在面板工具变量法模型 5 中, 回归系数下方为 z 统计量, 在其他固定效应模型中, 回归系数下方为 t 统计量。*、** 和 *** 分别表示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得逆向外包度与国家间双边关系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在模型 4 中引入工具变量“同各东道国滞后一期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ie_L）”来处理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如下：在各模型检验结果中，以工资衡量的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系数都为正，其中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通过了 5% 和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设 1 的猜想，即发达国家的高服务质量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驱动力；同样，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在各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在所有模型中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逆向外包与传统离岸外包类似，同样追求低用工成本，只是在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这种新型离岸外包中，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不是低的绝对用工成本，而是低的相对用工成本；另外，受全球学习汉语浪潮的启发，本文将各东道国使用汉语情况纳入到逆向外包驱动力探究的模型中，但实证结果的显著性并不理想，模型 1 甚至表现出与预期结论相反的情况，基于对该变量数据的统计梳理和实证结果，我们作出猜想：东道国精通汉语对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的确有促进作用，但基于汉语在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普及的现实情况，汉语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被极大弱化，也就是说，若汉语如英语一样在全球普及，则各发达国家的汉语使用程度差异可能才会对逆向外包的开展有不同影响，如同英语的作用已在传统离岸外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一样。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本文还引入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因素来考察其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其中，国家间双边来往变量 *relation*₁ 的系数在各模型的系数为正，并且大多模型都通过了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检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假说 4。但另一以伙伴关系级数来衡量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变量 *relation*₂ 的检验结果并不理想，大部分检验结果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在部分模型中的系数为负。通过观察数据发现，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为，以伙伴关系定义的国家间外交级别太过单一，没有以国家领导人的实际互动往来情况衡量的双边关系具体，因此，加大了检验结果的误差；最后，对于中国作为接包方的传统外包度及其滞后一期变量对我国开展逆向外包的驱动效果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离岸外包的确带动了逆向外包活动的开展，但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其滞后一期变量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相符，大部分模型的系数检验都为负，可见，传统离岸外包并不如预期估计的那样对逆向外包有强烈的正向驱动作用，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在逆向外包活动中，的确存在其属于发达国家企业充当主导外包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但目前存在的逆向外包业务中，大部分是新开展的活动；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市场前往其他更低成本的国家，比如东南亚，导致中国作为接包方的外包活动大大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离岸外包对逆向外包这种新型外包活动的带动作用。

（四）分行业逆向外包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张月友等^[3]对逆向外包的定义可以发现，逆向外包的离岸服务对象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考虑到服务业各分行业间具有强异质性特征，本文对逆向外包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到服务业分行业。为考察各因素对服务业分行业逆向外包的影响情况，参考 Rahman 等^[34]和樊茂清^[35]的划分，先按要素密集度将服务业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四大类（如表 3 所示）。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了解 2005—2014 年中国四大类服务业中间投入情况，并分别计算出中国作为发包母国对 16 个发达国家按服务业行业分类的逆向外包度。

表 3 服务业按要素密集度分类

类别	服务行业
资本密集型	房地产业；各类运输业；信息和通讯；电力、煤气和水的供应
劳动密集型	建筑业；各类零售和批发（不含汽车和摩托车）；汽车和摩托车的销售、保养和维修；燃料的零售；家庭物品的修理；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辅助运输活动
知识密集型	金融业；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国防及社会保障业；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公共服务业

表4汇报了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服务业分行业逆向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以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 相比于表2中总体样本回归的检验结果, 工资水平、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和双边来往变量的驱动力效果依然显著。另外, 以伙伴关系衡量的外交关系级别也变得显著为正。总体上, 相比于表2的样本回归结果, 以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效果更加理想, 可能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外包在整体服务业外包中占主要部分, 各主要因素对其影响程度更加明显。

表4 按要素密度分服务行业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ross_c$	$ross_l$	$ross_k$	$ross_p$
<i>wage</i>	0.000 808 5*** (2.85)	-0.000 183 7*** (-3.14)	0.000 279 9* (1.55)	0.000 016 2 (0.46)
<i>cost</i>	-0.036 132 1*** (-5.59)	0.006 915 2*** (5.20)	-0.010 397 1*** (-3.41)	-0.000 588 5 (-0.74)
<i>Chinese</i>	-0.000 270 9 (-0.10)	0.001 481*** (2.55)	-0.000 168 7 (-0.10)	0.000 725 2** (2.09)
<i>relation_1</i>	0.000 282 5** (2.27)	3.96e-07 (0.02)	-0.000 025 6 (-0.47)	0.000 016 5 (1.07)
<i>relation_2</i>	0.000 679 3* (1.79)	0.000 049 (0.63)	-0.000 180 7 (-0.78)	0.000 021 5 (0.46)
<i>oss</i>	0.007 901 4 (0.92)	0.001 712 7 (0.97)	0.002 507 8 (0.57)	0.001 001 4 (0.94)
<i>oss_L</i>	0.001 396 2 (0.15)	0.001 954 9 (1.01)	-0.000 666 6 (0.14)	-1.17e-06 (-0.00)
<i>_cons</i>	-0.014 294 2 (-1.52)	0.002 243 9 (1.11)	0.000 349 5 (0.88)	-0.001 844 (-1.5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i>N</i>	144	144	144	144
<i>R</i> ²	0.745 8	0.999 3	0.111 2	0.129 7

注: 各模型都为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系数下方为 *z*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为 10%、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 东道国工资水平和质量用工成本对逆向外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相比于表2中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 但两者的系数方向发生了变化。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类似于制造业的生产,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用工成本和可用劳动力是这类服务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而技术的提高只是辅助作用, 因此, 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工资变化的强度异常敏感, 以工资衡量的服务质量失效, 东道国工资水平仅反映该国家的用工成本, 同时, 将服务质量作为考虑因素纳入到相对用工成本的衡量中, 其对逆向外包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 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另外, 东道国汉语水平的系数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且系数为正, 相比于表2, 结果得到了改善, 说明语言作为驱动力的确有其微弱的作用。

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 工资水平和质量用工成本分别通过了 10%和 1% 的显著性检验, 而其他解释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甚至出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复杂且先进的高端科技技术, 而发达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及其全球顶尖创新性科学技术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而逆向外包的溢出效应, 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因此,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将此类服务业外包至发达国家, 继而, 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高服务质量和相对于高服务质量的高用工成本作为此类服务业外包驱动力的检验结果是合理的。

最后，相比于中国其他三种服务类型的逆向外包，以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的逆向外包作为考察对象，各驱动力对其的影响效果大大降低。其中，以工资水平衡量的服务质量高低和相对用工成本变量，虽依然表现出与表 2 中总体模型回归中一样的系数方向关系，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汉语水平变量的显著性增强，表现出了假设 3 的预期效果。基于对此大类服务业分行业中间投入数据的整理和实证结果，我们作出大胆猜测，由于此大类服务业外包数在总体外包中仅占较少部分，导致各驱动作用并不明显，同时，这类服务外包受政府干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此类外包中占据绝大比例的教育逆向外包，例如，国内教育机构和学校为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果，大量聘用外籍教师，因此，汉语的掌握对于这些教师在中国生存和施教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重新构建，新的逆向外包度表示如下：

$$ROSS_i = \sum_k \sum_j \frac{X_k^j}{Y_k} \frac{M_i}{M} \quad (8)$$

其中， X_k^j 表示第 k 服务行业生产所需第 j 服务行业的中间投入， $\frac{X_k^j}{Y_k}$ 表示第 k 服务行业总投入中来自第 j 服务行业产出所占的比重。基于 Feenstra 和 Hanson^{[30][31]} 将某行业的总进口占该行业总消费之比近似代替该行业作为中间投入中来源于国外那部分比例的启发，本文将 $\frac{M_i}{M}$ 近似代替中间投入中来自于 i 国的那部分所占比例，因此 $\frac{X_k^j}{Y_k} \frac{M_i}{M}$ 表示为第 k 服务业生产中用第 j 服务业产出作为中间投入中来自 i 国的那部分，即公式（8）的经济学含义为，中国为生产本国服务业产品对第 i 国服务业产品的利用率，其可代表中国对第 i 国的服务业逆向外包程度。

将新设定的逆向外包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检验模型（7）中各解释变量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总体逆向外包、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i>ross</i>	<i>ross_c</i>	<i>ross_i</i>	<i>ross_k</i>	<i>ross_p</i>
<i>wage</i>	0.016 417 1*** (3.06)	0.006 086 6*** (3.15)	-0.004 077 8 (-0.07)	0.004 372 5*** (3.11)	0.002 236 6*** (3.83)
<i>cost</i>	-0.309 547 7** (-2.27)	-0.098 199 3** (-2.00)	0.074 950 2 (0.07)	-0.073 170 7** (-2.05)	-0.019 713 7 (-1.33)
<i>Chinese</i>	0.120 587 5* (1.84)	0.054 086 7** (2.29)	0.003 892 6 (0.03)	0.029 768 6* (1.73)	0.014 301 3** (2.01)
<i>relation_1</i>	0.009 237 1*** (3.36)	0.002 458 5*** (2.48)	-0.017 191 3 (-0.76)	0.002 416 5*** (3.34)	0.000 962 5*** (3.21)
<i>relation_2</i>	0.000 318 2 (0.04)	0.000 269 5 (0.08)	0.006 146 3 (0.60)	0.001 029 8 (0.44)	0.001 207 3 (1.25)
<i>oss</i>	0.000 318 2 (1.19)	0.140 667 1** (1.93)	0.090 065 4 (0.07)	0.056 420 7 (1.06)	0.036 228 9* (1.64)
<i>oss_L</i>	0.275 736 4 (1.26)	0.061 172 6 (0.77)	-0.042 319 3 (-0.06)	0.077 002 8 (1.34)	0.026 268 7 (1.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44	144	144	144	144
<i>R</i> ²	0.221 9	0.242 4	0.115 9	0.146 7	0.001 1

注：各模型都为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下方为 z 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为 10%、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逆向外包的研究结果与上文中各模型检验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相较于表 4, 比 $ross_k$ 模型更接近于总体样本回归。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果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工资水平及质量用工成本对外包的影响依然与表 4 中 $ross_l$ 模型相同, 其他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与理论假设更相符。因此, 可以认为上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目前, 世界经济已进入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全球化转向基于全球创新链的服务业全球化的新阶段。而逆向外包作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创新链的重要途径, 自兴起以来就备受学术界关注。但纵观现有文献, 各类研究几乎都是从逆向外包为企业、国家实现效益的角度出发, 对逆向外包出现的源头并未作出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认为只有正确找出逆向外包得以成功开展的驱动因素, 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实施高水平、高效率的“走出去”战略, 才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创新性资源优势, 跻身于全球创新链中。因此, 本文着力于寻找逆向外包得以成功开展的驱动因素。

文章借鉴相关文献思想并通过分析传统离岸外包驱动力, 分别提出逆向外包业务得以开展的五个影响因素的假设, 认为高服务质量、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语言沟通水平、双边政治关系及传统离岸外包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逆向外包的开展, 并构建逆向外包度指标和计量模型, 使用面板数据, 对逆向外包的驱动力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

1. 以平均工资水平衡量的发达国家高服务质量能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其开展逆向外包。通过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 母国企业可以与东道国合作企业签订培训或技术转让等条款, 使得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进而大幅度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 逆向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创新性资源的有效途径。按要素密集度分类, 进一步实证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驱动力, 发现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分行业之外, 高服务质量因素对中国其他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的开展依然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工资水平变量对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的开展产生了负向影响,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对劳动成本的高敏感度导致利用工资水平衡量服务质量的效果失效。

2. 以发达国家用工成本与服务质量之比所表示的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因素对中国向其开展逆向外包呈负向关系。这一点与传统离岸外包追求低用工成本类似。但逆向外包中的低质量用工成本与单一的劳动工人工资衡量的成本不同, 它更多的是要求服务质量的提高幅度快于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同样, 对于各类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 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因素依然对其有负的显著性影响。

3. 在众多模型检验中发现, 由于汉语在各发达国家普及率还不高, 对中国对其成功开展逆向外包只表现出了弱的驱动作用。

4. 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中国向各国成功开展逆向外包的主要驱动力。

5. 传统离岸外包对中国逆向外包开展情况有促进作用, 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且其滞后一期变量与预期不符, 说明在中国, 以子包形式存在的逆向外包业务并不多见。

(二) 建议

虽然通过大量研究都证实了逆向外包有利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 增强国际地位, 并为我国带来创新技术和高科技人才, 帮助我国实现产业优化和结构升级。但中国能否顺利开展逆向外包, 并非纸上谈兵。

首先, 在进行逆向外包业务之前, 应注重区位选择。实施逆向外包的目的除了要更好地创造出

服务产品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业务互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网络全球高科技工程人才,因此,逆向外包对接包国家的人才素质及科技技术要求较高。

其次,政府应发挥推动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有效开展,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逆向外包进程,进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型企业,其发展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其“走出去”的步伐。因此,着力改善中小企业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环境应成为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既应从改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入手,简化海外投资、并购等的审批程序,也可以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金融支持等。另外,中国如想加快逆向外包步伐,应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实施下,中国不断加深与沿线国家在交通运输、能源工业等领域的合作,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一条重要渠道,也为我国向沿线国家开展逆向外包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Lewin, A. Y., V. Couto. Next generation offshor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ion (Duke University CIBER/Booz Allen Hamilton Report)[R]. Durham, NC: Duke CIBER, 2007.
- [2] Lewin, A. Y., S. Massini, C. Peeters. Why are companies offshoring innovation? The emerging global race for tal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6).
- [3] 张月友, 刘丹鹭. 逆向外包: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5).
- [4] Sen, P. *India and China Start Reverse Outsourcing of Foreign Pilots to Counter Shortages*[EB/OL]. <http://www.indiadaily.com/editorial/3997.asp>, 2005.
- [5] 普华永道. 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展望[EB/OL]. http://www.pwccn.com/home/chi/tslibrary_chi.html, 2016-11-04.
- [6] 江小涓.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 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7] 刘志彪. 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2(2).
- [8] 刘志彪.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 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 *学术月刊*, 2015(2).
- [9] Kedia, B. L., D. Mukherjee. Understanding offshor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disintegration, loc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advantag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3).
- [10] 刘丹鹭, 岳中刚. 逆向研发外包与中国企业成长——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主汽车品牌的案例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 2011(4).
- [11] 郑飞虎, 常磊. 跨国公司研发外包活动的研究: 中国的实证与新发现[J]. *南开经济研究*, 2016(4).
- [12] 陈启斐, 刘志彪. 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 2013(11).
- [13] 陈羽, 黄晶磊, 谭蓉娟. 逆向外包、价值链租金与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4).
- [14] Richards, M., Y. Yang.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ow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R&D joint ventur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national cul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7(2).
- [15] 孟雪. 反向服务外包如何影响中国的就业结构——以中国作为发包国的视角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9).
- [16] 孟雪. 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7).
- [17] 吴凤羽, 唐华明. 跨国反向服务外包模式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的比较研究[J]. *国际商务研究*, 2015(5).
- [18] 岳中刚. 逆向研发外包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4(6).
- [19] 陈启斐, 王晶晶, 岳中刚. 研发外包是否会抑制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2).

- [20] Modwel, S., T. Jelassi. Productivity of India's offshore outsourcing sector: Business-based evidence[J]. *Policy Brief*, 2010(2).
- [21] 沈春苗. 逆向外包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J]. *财经研究*, 2016(5).
- [22] Hahn, E. D. *Reverse Offshoring of Services: The New Wave of Emerging Offshorers*[R]. Work paper, 2010.
- [23] Smith, M. A., S. Mitra, S. Narasimhan. Information systems outsourcing: A study of pre-event firm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015(2).
- [24] Johanson, J., J. E. Vahln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1).
- [25] 杨卫东. 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文化帝国主义[J]. *国际论坛*, 2013(4).
- [26] Doh, J. P., K. Bunyaratavej, E. D. Hahn. Separable but not equal: The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discrete services offshoring activit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6).
- [27] 潘镇, 金中坤.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 *财贸经济*, 2015(6).
- [28] Kostova, T., K. Roth, M. T. Dac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 critique and new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4).
- [29] Tholons Inc. *Reverse Offshoring: Trend or Strategy*[R]. Tholons Services Globalization Review, 2008.
- [30] Feenstra, R. C., G. H. Hanson.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R]. *Nber Working Papers*, 1997.
- [31] Feenstra, R. C., G. H. Hanson.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3).
- [32] Crinò, R. The effects of offshoring on post-displacement wag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J]. *World Economy*, 2010(12).
- [33] 张建红, 姜建刚.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12).
- [34] Rahman, J., T. Zhao. Export performance in Europe: What do we know from supply links [J]. *IMF Working Paper*, 2013(13).
- [35] 樊茂清, 黄薇.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 *世界经济*, 2014(2).

Empirical Study of Reverse Offshore's Driving Force

ZHANG Yue-you, FANG Jin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ffshore outsourcing, reverse outsourcing offer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way to climb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enhance thei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world input and output table from 2005 to 2014,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reverse outsourcing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reverse outsourcing strategy.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relative labor cos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 with China have a steady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conducting reverse outsourcing. Further classification regression of service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factor shows that only the regression of labour-intensive service is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the overall sample model, while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service industry have similar results with the overall sample regression.

Key words: reverse offshoring of services; driving force; quality of service

(责任编辑 孙洁)